



书苑摘英

我们创造的历史 我们的中国梦

推荐理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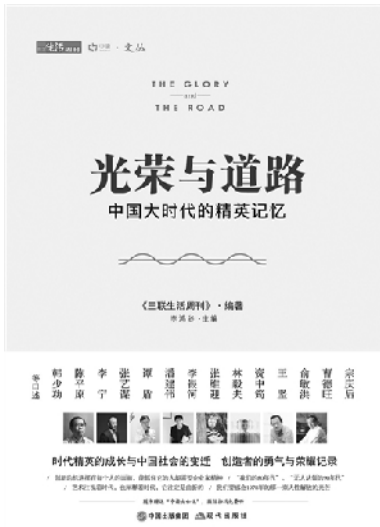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翘楚、行业领袖人物、国家高层智囊的集体传记，通过他们的口述，重现了他们的成长与创业历程，并以此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、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重塑，以及时代变局下，中国社会不同寻常的发展轨迹和成长逻辑。

伟大梦想是拼出来、干出来的

中国大时代成就了他们的辉煌，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勇气和创造力，引领和改变着这个时代。作为站在中国各个行业最顶端的人，在本书中，他们也分享了相关领域最前沿，而且是最富前瞻性的真知灼见与相关资讯，有助于广大读者准确把握行业的脉搏和走向，理性看待中国社会的真实状貌，探索未来的发展与转型之路。

本文摘

自《光荣与道路：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》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编著，现代出版社 2019 年 3 月出版。



1978 年到 2018 年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一部非凡的戏剧。这一幅起故事的最独特之处，是并无一张清晰、完整、现成的蓝图，而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行动理念下，由众多充满乐观、活力、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个体共同创造的。

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创造了诸多奇迹。近 10 年开端的 2008 年注定不寻常。在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会高强度冲击着人们的情感，同时也考验着国家的应对能力之后，9 月 15 日，次贷危机波及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，全球金融海啸席卷而来，中国经济政策也随之大转弯。在此之前，中国已经连续 5 年 GDP 增速超过 10%，而到 2008 年 11 月，出口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，经济政策开始从紧缩转为扩张，全力“保 8”。11 月 9 日，中央政府宣布将启动拉抬内需计划，两年内扩张投资 4 万亿元，其中最大比例部分 1.5 万亿元，都用于铁路、公路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。

随着人口红利消失，“城市化”速度放缓，房价泡沫的隐忧浮现，外延式发展模式开始不可持续。房地产狂飙的另一面，是实体经济的低迷。“中国制造”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逐渐丧失，面临转型的拐点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经济在 2010 年左右爆发出新的红利，这一轮是由互联网带来的。

自 2010 年开始的这些年，互联网的风口变换特别快，而只有勇敢者和幸运儿才能在风口上飞起来。2011 年，雷军站在了他认为的风口“智能手机”上，与乔布斯发布 iPhone 如出一辙，发布了小米手机，小米手机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手机产品。下一个风口是团购，也是在 2011 年，吴波的“拉手网”成功获得融资，在几个月内引发 5000 多家团购网站入场，堪称“百团大战”，尽管一年后硝烟散尽，最终只有 1%活了下来，“美团”和“大众点评”形成对峙，依然让人们见识到“O2O”（线上到线下）被激活的魔力。之后是微信，2012 年，腾讯的微信朋友圈功能上线，仅仅一年多后，用户数即破亿。微信迅速颠覆了之前的博客和微博模式，它让传播变得更加有效，也更加碎片化，极大地改变着

媒体和商业生态。还有 2012 年张一鸣创立的“今日头条”，以算法精准推送新闻，程维的“滴滴打车”，改变着出行方式。而这些风口，都建立在移动互联网的基础上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一方面，BAT 把控着互联网最重要的三个应用入口——百度坐上了搜索引擎的头把交椅；阿里利用淘宝和支付宝重新定义了消费；腾讯则借助微信占据了社交媒体高点。而另一方面，2016 年以来，各种新玩法仍层出不穷：共享单车、直播、快手、抖音……往往是掀起一股狂潮之后，就被更新的产品取代。可以说，互联网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边界，而反过来，它也颠覆和重新定义着自身。

无疑，互联网驱动下的“新经济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。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，中国互联网公司还只是模仿者和跟随者，那么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昔日的模仿者则摸索出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和盈利模式，而且已经从虚拟经济继续渗透到了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。2016 年，李克强总理在当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第一次提出“新经济”：“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，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，加快发展新经济。”他强调，要依靠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推动形成新的经济模式、新的业态，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动力。

大约从 2014 年起，改革进入“下半场”达成共识。如果说“上半场”的驱动力是投资、出口、消费“三驾马车”，下半场则转向供给侧驱动，转向创新驱动。事实上，从 2012 年起，中国的 GDP 增速开始回落。中央政府在 2014 年提出“新常态”，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变，中国已经告别过去 30 多年平均 10%左右的高速增长，因此，需要“改变一切向钱看的成长方式”。

四十不惑。从 1978 年到 2018 年，中国改革开放历经 40 年，对于经济、政治和文化而言，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。这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从“计划”向“市场”转型，也意味着一个几千年来占人类 1/5 以上人口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。转型已经发生，也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

定性。周其仁说，如果说前 40 年的改革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那么，现在水面上已经露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很多石头露出很久了，能否去面对和跨越这些“石头”，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。

比如制度建设的挑战。在改革的后半程，学者们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滞后的警惕。1991 年，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“制度大于技术”，之后更是充满忧患地呼唤法治市场经济。而 2003 年，在两大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“后发优势”和“后发劣势”的著名论辩中，杨小凯的警告发人深省：“落后国家可以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，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。但是，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。”

还有中国在世界的角色。在目前全球化逆转的危机下，中国似乎成了唯一在推进全球化的大国。在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，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：20 世纪 80 年代是第一个阶段，中国实行“请进来”政策；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，实行“接轨”政策，以加入 WTO 之前的努力为代表；第三个阶段则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的“走出去”政策，再一次积极出击，“一带一路”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。

对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亲历者来说，对下一步改革的期待也是多元的。一方面，不同代际、不同阶层的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另一方面，做大蛋糕之后，怎么分蛋糕又构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。而且，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，也是精神层面的，特别是当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、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时。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拍摄中国的刘香成所说，如果说西方国家经历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一步接着一部，那么，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就像是高速前进的车。40 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专注弥补“失去的几十年”的一种方式，人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。如今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，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和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，“中国梦”在精神层面还在延续。



文化记忆

吃元宵的习俗 是怎么来的

人们都知道正月十五是元宵节，而且也知道元宵节要吃元宵。但是，您知道吗，正月十五最早不叫元宵节，而且也不吃元宵。

那么，正月十五最早叫什么节呢？正月十五最早叫上元节。

为什么叫上元节？这得从道教说起。道教文化的核心之一是“三元”神说，所谓“三元”，即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

这“三元”都是神官，上元是天官，中元是地官，下元是水官。他们的生日分别是：上元是正月十五，中元是七月十五，下元是十月十五。

在古代，每逢“三元”的生日，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。正月十五这天要举办许多活动，所以人们又把它叫作“上元节”。据史书记载，“三元”节日从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。《史记·乐书》中记载：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，以昏时夜祠，到明而终。”

“太一”也叫“泰一”，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供奉的天神。这就是说，到了汉代，正月十五奉祀“天神”的活动，通宵达旦。

因为奉祀天神是在夜里，家家户户都要点灯，于是这种奉祀活动，到了隋唐，逐渐演变成观灯赏灯的灯节。

但直到宋代，才有上元节吃元宵的民俗。

为什么叫元宵呢？元宵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？

这跟上元节有直接关系。您想，从汉代起，人们过正月十五上元节，都是成宿成宿地观灯赏灯，热热闹闹的，到了夜里能不饿吗！

按南方人的生活习惯，夜里饿了，要吃点东西，南方人管这叫“宵夜”，北方人管这叫“夜宵”，总之都有个“宵”字。

“宵夜”吃什么好呢？南方人喜欢把糯米团当零食。光有糯米没馅儿不好吃，于是人们把它包进了馅儿，取名“汤圆”。

到了宋代，先是南方人，后是北方人，把“汤圆”作为上元节的“宵夜”，因为是上元节的夜里吃的，所以人们又把它叫“元宵”。后来，逐渐演变成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习俗。

再后来，也就是到了明清时代，老百姓干脆把上元节改叫元宵节了。

如今，元宵在南方依然叫汤圆、圆子，做法是用糯米面直接包。北方人聪明，根据摇煤球的经验，发明了摇元宵的方法。

元宵的品种很多，在老北京以“八宝元宵”为最佳，据说这是正月十五宫里御膳房给皇上做的，现在市场上很少见。次之是“桂花元宵”，也很少见，因为在北方的正月，桂花很难淘换。

20 年前，每到元宵节前，北京的副食店和老字号饭馆门前，就摆上摇元宵用的铁制的大筐箩，筐箩下面有能转动的发动机，发动机一开，铁筐箩就来回“摇”，职工现场加面添水，现摇现卖。这也是当时京城过正月十五的一景儿。

(选自《文摘报》)